

社会经济史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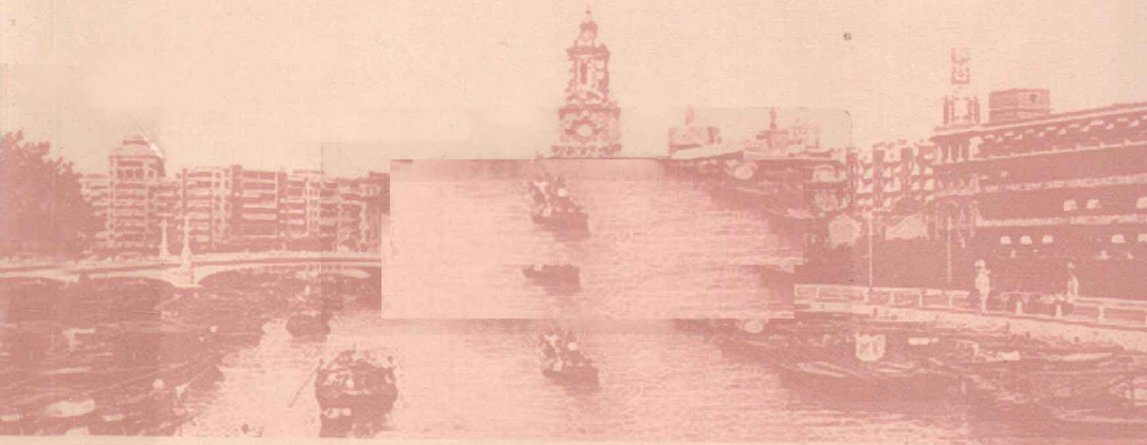
[美] 卞历南 著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制度变迁的逻辑

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

[美] 卞历南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
会
经
济
史
译
丛


[美] 卞历南 著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制度变迁的逻辑

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

[美] 卞历南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谨以本书献给陈徽

总 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

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显得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与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能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中文版序言

承蒙社会经济史译丛主编龙登高先生的青睐，本书得以与中文读者见面。事情的缘起是在2005年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太昌先生邀请，我就本书的主题与该所专家进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后来，经济研究所袁为鹏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上对本书英文版进行了专题评论。2008年秋，应龙登高先生邀请，我为清华大学部分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介绍了本书的观点。

在此，我由衷地感谢龙登高先生将本书纳入这套社会经济史译丛。我还要感谢袁为鹏先生在中文读者中对本书之大力举荐。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赵琼女士在编辑出版本书过程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对她的帮助，我心存感念。最后，我要感谢对我的学术发展与心路历程发挥过积极影响的各位学者与个人：安德莉亚·麦克尔德里、陈兼、大卫·包克曼、道格拉斯·诺斯、丁则民、高家龙、哈利·安蒙、霍华德·艾伦、黄仁伟、黄宗智、柯博文、柯丽莎、柯伟林、肯尼思·派尔、肯特·盖尔、梁侃、任东来、宿丰林、汤玛斯·库恩、王旭、威廉·豪斯曼、威廉·特利、吴天威、约翰·希蒙、游恒、赵轶峰、张永前、周锡瑞以及周振华。

本书旨在说明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为何以及如何形成。在此过程中，本书不仅试图重新解释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与单位制度的起源与形成，而且还试图总结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新理论。作者的观

点与理论是否言之成理，相信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在这里，我就个人经历、理论兴趣、历史知识和研究焦点几个方面向中文读者交代一下促成本书观点与内容的思想资源与知识结构。

由于家父的影响，我对理论的兴趣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父亲在一家省级法院从事审判工作，他购买并阅读许多包括马列经典在内的理论著作。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父亲返回地处北大荒的家乡。尽管有“反右”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动荡，但父亲一直保留着他当年阅读过的经典著作。在那个物质和精神资源均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经典著作在我进入中学时就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清楚地记得，《反杜林论》与《哥达纲领批判》就是在那时通读的。

1977年冬，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被家乡的牡丹江师范学院政治系录取。在大学期间，部分是由于专业的关系，我阅读了更多的经典著作，首次将《资本论》第一卷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1981年，我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近代史美国史专业硕士学位。1984年年底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授美国历史。尽管如此，我始终保持着对理论的兴趣并阅读了不少西方学术著作的中译本。

1988年赴美留学后，出于对理论的持久兴趣，我选择政治学的某些课程作为我的一个领域（每个领域由几门相关课程组成）。在南伊利诺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1988—1991），我选修了政治系的相关课程。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91—1998），中国政治成为我的四个领域之一。1983年，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斯在华盛顿大学任教长达三十余年（1950—1983），他的获奖不仅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也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他的著作，其中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诺斯的著作又引领我关注科学发展的一般性理论著作以及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著作。

读者将会看到，本书无疑受到上述三方面理论，尤其是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构成了本书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其一，该理论对制度概念的定义过于狭窄；其二，该理论关注的主要是呈现路径依赖特征的渐进的与改良性的制度变迁，未能对呈现路径独立特征的激进的与革命性的制度变迁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三，作为在欧美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经济学范畴之内的一个学派，该理论未能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普遍适用之理论体系。本书所提出的关于制度变迁的新理论，旨在克服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上述局限，并将这一理论有效地应用于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研究。

除去多年来对理论的浓厚兴趣之外，本书一些关键章节的讨论极大地受益于我对中外历史尤其是中美两国历史的长期研读。中国历史是我读大学本科的核心课程之一。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使我对美国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一兴趣在我本科毕业前撰写的一篇充满稚气的短文中反映出来。这篇题为《门罗主义历史作用初探》的短文刊登于1981年第1期的《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获得本科学位之后，我有幸在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先生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去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即我后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学校）攻读美国历史的硕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返回中国并自1952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82年初，先生招收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共四人，我是其中之一。作为全国著名的美国史学者，先生学风异常严谨，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开始，先生主编《美国通史》六卷本的第三卷，即《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2005年再版），并将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一章交给我写。1988年，我有幸获得美国南伊利诺大学的奖学金，前往该校进一步攻读美国历史，直到1991年夏。今天看来，十年（1982—1991）的中国东北与美国中部的“寒窗”让我

对美国历史有了长足的了解，同时对本书中诸如国营企业中成本会计制度与单位制度之美国根源的分析准备了充足的知识资源。

1990年前后，我决定放弃攻读美国历史，改学中国近现代历史，并选择了华盛顿大学来圆我的博士梦。始料未及的是，我在那里一读就是七年。在最初几年时间里，我一边读书，一边教课。在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研究型公立学校中，助教的工作不仅仅是批改学生作业，每周还要用教授布置的书目组织一次讨论，颇费精力。此外，该校历史系要求博士生成为博士候选人之前选完四个领域的课程。我自讨苦吃，没有把美国历史选作我的一个领域，而是选择了近现代中国、中国政治、近现代法国和近现代日本作为我的四个领域。最后，写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常常需要长达一年时间的原始及档案资料的收集工作，颇费时日。

“雨窗”（西雅图多雨）七年，我对美国乃至西方的历史思维以及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了解，同时也比较深刻地了解了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状况。我发现，尽管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进行了不少颇为深入的研究，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相当薄弱。基于这种了解，我决定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抗日战争与新的中国国营企业制度模式的形成。

具体说来，这一焦点的确定与当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有着直接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的连续性。如果连续性的确存在，那么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提出并探讨这一问题的包括著名学者柯伟林与周锡瑞等人。不过，作为学科的“掌门人”，他们并没有通过非常深入的具体研究来进行验证。建立在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政治经济演变的研究仍然付诸阙如。显然，没有这样的研究，就无从建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旨在填补西方研究者在此问题研究上的相对空白。

有耐心读到本书结论的读者会看到这样一段话：“本项研究表明，最近发表的关于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存在着连续性的学术见解是正确的。正如这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1949年后制度安排的某些因素确实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因此，这个领域中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建立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是否存在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问题，而是需要理解1949年之后国家权力何以在政治、经济，以及行政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中保持以及扩充现存制度，包括保持以及扩充现存的源于延安时期的制度。”

尽管如此，本书的下限基本上是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本书无意亦无法表明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行政领域中的连续性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解释1949年前后两个时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行政领域中所存在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我在本书英文版出版（2005年）后所一直探讨的问题。我在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与读者见面。

· 卜 乃 南

2011年1月26日于美国奥本大学

致 谢

在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很多个人与单位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本书之撰写是很难想像的。

就我在历史学领域里所获得的知识而言，我感谢霍华德·艾伦 (Howard Allen) 教授、大卫·包克曼 (David Bachman) 教授、丁则民教授、肯特·盖尔 (Kent Guy) 教授、雷蒙德·琼纳斯 (Raymond Jonas) 教授、肯尼思·派尔 (Kenneth Pyle) 教授、约翰·希蒙 (John Simon) 教授、威廉·特利 (William Turley) 教授和吴天威教授。我特别感谢肯特·盖尔教授、柯伟林 (William Kirby) 教授和肯尼思·派尔教授给予我的鼓励、鼓舞、支持以及指导。就我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所获得的知识来说，我极大地受益于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与汤玛斯·库恩 (Thomas Kuhn) 等学者的著作。

许多学者、同事以及朋友对我的著作都曾提出过有益的批评与建议。他们包括斯蒂芬·埃夫里尔 (Stephen Averill)、陈兼 (Chen Jian)、高家龙 (Sherman Cochran)、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费景明 (Mark Frazier)、罗伯特·加德拉 (Robert Gardella)、黄宗智 (Philip Huang)、柯丽莎 (Elisabeth Köll)、黎志刚 (Lai Chi-Kong)，以及爱德华·麦科德 (Edward McCord)。我感谢他们的帮助。柯博文 (Parks Coble)、韦恩·弗林特 (Wayne Flynt)、肯尼思·诺埃 (Kenneth Noe)，以及安德莉亚·麦克尔德里 (Andrea McElderry) 审阅了整部书稿并提

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与奥本大学 (Auburn University) 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在华盛顿大学, 我先后获得该校历史系提供的朗德·埃文斯 (Rondeau Evans) 博士论文奖学金, 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提供的切斯特·弗雷次 (Chester Fritz) 奖学金, 以及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院提供的 T. H. Kwoh 奖学金。这些资助使我在中国从事档案资料研究成为可能。华盛顿大学提供的人文学科博士论文奖学金, 使我得以在 1998 年夏季完成博士论文之撰写。1999 年与 2002 年奥本大学提供的两项研究经费, 使我继续在中国从事档案资料研究成为可能。

对于完成这项研究, 不可缺少的是对档案资料以及其他资料之收集。为此, 我感谢下列中国档案馆以及图书馆: 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以及云南省档案馆。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长与馆员。在多次的资料收集与调查研究过程中, 我不仅在同专家、教授以及学者的交流中受到启发而且得到这些专家、教授、学者以及个人的多方帮助。为此, 我特别感谢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的陈红民与陈谦平教授, 四川大学的凌耀伦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方建教授, 重庆市档案馆的陆大钺馆长、黄立人与唐润明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吕其苏馆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骅馆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太昌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荣维木研究员,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孙宅巍与王卫星研究员, 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周振华所长。

柯博文与柯伟林两位教授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审阅了这部书稿, 我要特别感谢他们。在哈佛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麦克德莫特 (Kathleen McDermott) 从一开始就对出版本书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时, 她还在出版过程中提供了种种建议, 对于我的各种询问始终给予及时答复。我

由衷地感谢她。我还感谢在韦斯特切斯特图书公司（Westchester Book Services）负责本书编辑与出版的路易斯·帕克（Lewis Parker）。我特别感谢贝蒂·布雷斯萨哥妮（Betty Pessagno）所作的一流的校对工作。最后，奥本大学图书馆数据资源实验室的克里斯托弗·密克森（Christopher Mixon）对本书的图片进行了处理，提高了图片的清晰度，我在此表示感谢。

在此我还感谢奥本大学，尤其是奥本大学历史系同仁的支持。同时，我的许多朋友以及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同学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与支持。这些朋友与同学有哈利·安蒙（Harry Ammon）、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陈兼、戴莹琮、黄仁伟、李仪、梁侃、罗宾·麦克尼尔（Robin McNeal）、史蒂文·迈尔斯（Steven Miles）、任东来、汤马斯·赖利（Thomas Riley）、詹妮弗·鲁道夫（Jennifer Rudolph）、史蒂文·尤喘（Steven Udry）、王旭、游恒、翟强。不过，我最为感激的是我太太陈徽。没有我太太的支持与她所作出的种种牺牲，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最后，企业史协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允许我将我此前发表的论文的一部分经过修改后在本书中重印，我在此表示感谢。这篇论文的标题为：《抗日战争与中国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大渡口钢铁厂个案研究（1938—1945）》。此文发表于《企业与社会》（*Enterprise & Society*）第3卷，2002年3月，第80—123页。与此同时，本书还引用了我此前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的资料。该篇论文的标题为：《构建国家结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国家制度合理化运动（1937—1945）》。此文发表于《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第31卷第1期，2005年1月，第35—71页。本文资料之使用得到圣贤出版公司（Sage Publications）的许可。

目 录

前言 / 1

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 / 3

本书的理论框架 / 8

本书的核心观点 / 20

第一章 兵器工业的发展 / 24

第一节 1928年前的兵器工业 / 24

第二节 1928年后的兵器工业 / 33

第三节 兵器工业的内迁与扩张 / 44

第二章 重工业的扩张 / 59

第一节 国家资源委员会 / 59

第二节 重工业发展的计划与融资 / 69

第三节 重工业扩张的过程 / 79

第四节 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重工业中的比重 / 97

第三章 企业的治理结构 / 105

第一节 兵器工业企业的治理结构 / 106

第二节 重工业企业的治理结构 / 115

第三节 国营企业中的组织变化 / 126

第四节 企业治理结构中技术官僚的兴起 / 132

第四章 企业管理与激励机制 / 144	
第一节 兵器工业的新会计制度 / 144	
第二节 重工业的新会计制度 / 157	
第三节 工作竞赛运动 / 162	
第五章 企业的社会服务与福利 / 178	
第一节 战前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演变 / 178	
第二节 兵器工业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的扩张 / 183	
第三节 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扩张的原因 / 192	
第四节 重工业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及其政策的发展 / 204	
第五节 国防工业以外的社会服务与福利制度 / 209	
第六章 国营企业单位名称的由来 / 212	
第一节 国民党国家制度合理化的思想根源 / 213	
第二节 行政三联制 / 221	
第三节 单位的名称 / 231	
第四节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单位 / 236	
第七章 国民党发展国家的意识形态 / 246	
第一节 国营企业而非民营企业 / 247	
第二节 重工业而非轻工业 / 257	
第三节 国防而非民生 / 262	
第四节 计划经济而非自由放任 / 268	
结论 / 284	
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形成 / 284	
本项研究的意义 / 289	
索引 / 293	

前 言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刚刚结束的今天，中国国营企业的命运尚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说，20 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国营企业制度兴起、发展的历史。在本书中，“国营企业制度”一词系指中国国营企业具有界定性的组织与管理特征。就其渊源而言，这些特征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开始形成。及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工业的所有部门及企业都已经表现出这些特征。在 1949 年以后的三个 10 年中，这一国营企业制度不仅构成了中国经济制度之核心，它还是中国国家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所有国营企业都被置于国家经济官僚机构的管辖之下。这些国营企业具有界定性的特征，包括官僚治理结构，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以及为职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①

中国国营企业这些具有界定性的特征在重庆钢铁公司表现得十分明显。1994 年，重庆钢铁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50 家工业企业之一，

^① 国家行政机构之官僚组织模式是中国制度禀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与制度的范围之内并且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政府官僚机构是一个行政机构。这个行政机构里面设有不同等级之职位，这些职位由上级任命之官员担任。此外，这些官员有着不同的行政级别以及与这些级别相应之权力和待遇。同时，这些官员之权力及职责之规定来自行政法规或规定。这里强调指出的是，本书中，“官僚机构”和“官僚治理结构”等均是研究中的特定概念，是本书研究时段的研究对象。

其职工总数为 49 625 人，资本总额为 60 亿元。^① 首先，重庆钢铁公司的组织与作为正式的行政官僚机构之组织极为类似。该公司的主要领导包括总经理、党委书记，以及几位副经理和党委副书记。就组织机构而言，重庆钢铁公司共有 69 个处级单位，其中包括 23 个厂矿、14 个直属单位、职能处室 22 个，以及党群处室 8 个。很多处级单位与生产活动并无直接关系，其中包括党组织以及党所控制的工会及共青团。这些处级单位还包括许多提供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服务与福利的组织。^② 所有处级以上领导都由上级任命并拥有与职位相应的行政级别和权力。

其次，重庆钢铁公司的领导与管理人员经常使用像“竞赛运动”这样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激励机制来鼓励工人增加生产。例如，1994 年重庆钢铁公司组织 15 个工厂，设置 66 项指标，开展技术经济指标赶超历史先进水平竞赛。^③ 与此同时，该公司以“职工技术运动会”、“千人练兵”等形式，分厂矿、车间两个层次，组织 12 321 名职工参加 153 个工种、工序的技术培训、练兵、比赛活动。^④ 甚至像重钢团委与重钢科协这样的群众组织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竞赛运动。^⑤

最后，重庆钢铁公司为其职工提供综合性的社会服务与福利。截至 1994 年，重钢本部已拥有住房 36 968 户。^⑥ 另外，重钢在教育处下设有 1 所教师进修学校、1 所青少年业余体校、11 所中小学校、7 所幼儿园（托儿所），以及 12 个校办企业。^⑦ 重钢在卫生处下设 1 家医院以及 4 个门诊部，拥有综合医疗设备及职工计 811 人。^⑧

① 《重钢年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7 页。

② 前引书，第 54 页。

③ 前引书，第 105 页。

④ 前引书，第 158 页。

⑤ 前引书，第 183、187 页。

⑥ 前引书，第 193 页。

⑦ 前引书，第 144 页。

⑧ 前引书，第 197—198 页。